

# 赤道人谈食忆趣

## 在老报人家里吃薄饼（上）

在东北，春天吃薄饼，成了人们的一种爱好；因此薄饼也叫“春饼”。我第一次吃到薄饼，是1958年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在报社一位老编辑黄抗家里吃的。

黄抗是我到报社上班后第一个认识的人。5月3日我到报社报到，分配到总编室夜班编辑组工作，接待我的便是黄抗。他是夜班编辑组的负责人，年过四十，颇有长者风度，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位待人和蔼、谦虚、诚实、厚道的人。一见面，他就对我说：“小黄，我也姓黄，你以后就叫我老黄，或直接叫我黄抗吧！”

几天之后，我从一些同志的口里得知黄抗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。黄抗是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老报人。黄抗的历史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他是辽宁人，1938年血气方刚的黄抗在沈阳参加抗日宣传活动，被日本人通缉，便同女朋友（当时他们正热恋中）一起奔赴抗日圣地延安。黄抗原名黄刚，女朋友叫李慧，为了表示抗日决心，踏上征途之前，黄刚改名黄抗，女朋友改名李战，以示两人“永结同心，抗战到底”。到了西安之后，在一些东北老乡的误导下，黄抗没同李战一道去延安，而是到了

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重庆，在蒋经国当校长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习，毕业后又在国民党的《扫荡报》当记者。在重庆期间，黄抗参加了高崇民的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“8.15”光复后，他和蒋经国同坐一架飞机到长春，接收长春市的文教工作，也算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；解放军围困长春时，黄抗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起义活动，把他以前收集的国民党人员的资料交给了党的地下组织；解放军入城后，便按图索骥抓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特务，顺利地接管了该市的文教工作；此时，他是立了功的。长春解放后，黄抗被安排到《牡丹江日报》工作。

我上班不久，报社一位领导就对我说：“黄抗是我们党的老朋友，他过去在国民党的那段历史，已经搞清楚，早有结论了；他曾多次要求入党，但因为那段历史，支部难于统一认识，无法解决；他本人还是靠近党的。”这位领导要我以后多向黄抗学习，说他是老报人，不但精通业务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、任劳任怨；要我同他交朋友，在思想和政治上多帮助他。看来这位领导对黄抗是很器重的。当黄抗邀请我到他家里“坐坐”的时候，我便爽快地答应。

到了黄抗家，还没到11点，他已准备好了饭菜。桌上摆着几样冷盘：油炸花生、酱猪肘片、俄罗斯大红肠圈，还有一盘薄饼和“炒四丝”——粉丝、蛋丝、肉丝、韭菜合炒。寒暄一阵之后便入桌。东北人似有这么个规矩，家里请吃时，主妇和小孩是不陪客的，他们或在客人走后再吃，或另在外屋随便吃。黄抗的爱人冰雪梅是老革命，1947年入党，满族，时任市煤炭公司支部书记。出于对她的尊敬，我几次请她入座，都被她婉言谢绝；最后，她倒了一杯啤酒，到我跟前来：“小黄同志，我敬你一杯吧，你同老黄好好喝几杯，别客气。”我不会喝酒，喝了一口后就搁下酒杯，她也没强求我干杯，自己倒落落大方地干了一杯，然后到外屋去了。

黄抗是在1949年夏同冰雪梅结婚的，婚后育有两男一女，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。但说起黄抗的婚姻，却有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黄抗同他的“抗战情侣”李战自1938年西安分手后，便失去了联系，他多方寻找，音讯全无；1949年初，他接到在东北民主联军工作的一位朋友的来信，说李战在平津战役中光荣牺牲，黄抗只好把对李战的恋情深深地埋

在心中，以后在朋友的劝慰下，内心的创伤逐渐愈合。1949年夏，黄抗经朋友的介绍同冰雪梅认识；不久便喜结良缘，成了一对恩爱夫妻。不料结婚后的第二年，突然从北京寄来了一封信，正是他的“抗战情侣”李战寄来的。来信情意绵绵地叙述着别后十余年的思念之情。原来她到延安之后，在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，便去晋察冀边区工作；日本投降后，她又随部队转战东北，之后随百万大军入关，参加了平津战役，在围攻天津的一次战斗中负伤，建国后在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工作。在她负伤住院期间，外间谣传黄抗已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，直至1950年初，她才从一位起义人员中得知黄抗在长春围城中光荣起义，经过她多方的寻访，最终打听到黄抗的下落；她至今仍等待着黄抗，

希望他接信后能到北京相晤，以续旧情。可见情义之重。这封信对黄抗来说，无异是晴天霹雳。黄抗接信后心情沉重，只得如实相告，希望能宽宥他这个负心人。这是一封用泪水写成的信。在长期战乱中，被战火打散的鸳鸯何止他们一对。对于这种因战乱而造成的历史的误会，最后还是得到了对方的谅解。此后，他们仍保持着纯洁的朋友关系。

我和黄抗喝过了几口啤酒，冰雪梅同志进屋来了，她把一张薄饼摊开在小盘上，然后将那“炒四丝”夹在薄饼上，双手轻轻卷成小筒状，两头窝紧以免露馅，便示意我可以吃用了。吃春饼，黄抗当然是老手，他是自己卷的。我是第一次吃到春饼的，味道不错，边谈边吃，一连吃了五张。



北方人喜欢春天吃薄饼